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我们积极地开展了学术研究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为了检阅我馆在科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加强学术交流，总结科学研究工作的经验教训，推动科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编辑了《沈阳故宫博物院论文集》。本集共收入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我馆专业人员在省内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共二十八篇，其中包括古代建筑、文物考证、典章制度，以及历史人物等内容。我们相信，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我馆的科学研究活动必将更加活跃，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编 者

一九八三年四月

目 录

关于沈阳清故宫早期建筑的考察·····	铁玉钦 王佩环	1
沈阳故宫凤凰楼建筑年代考·····	王佩环	31
论清入关前都城城郭与宫殿的演变·····	铁玉钦	35
大政殿与崇政殿建筑陈设考·····	王明琦 王庆先	44
论清宁宫与萨满祭祀·····	王明琦	47
盛京定更钟考·····	王明琦 李仲元	50
沈阳石经幢考·····	王明琦	56
最早记录沈阳的碑刻····· ——(元代沈阳城隍庙碑)	沈长吉 王明琦	61
沈阳太平寺锡伯碑考略·····	铁玉钦	65
清弘毅公额亦都残碑简报·····	李凤民	70
《萨尔浒之战书事》碑和十王亭·····	王庆先 王洪源	73
略谈《满文老档》的文学描写·····	铁玉钦	76
《满文老档》二则质疑·····	王明琦	81
从乌拉纳喇氏殉葬看清初皇权斗争·····	沈长吉 王佩环	83
“大福晋为富察氏”考辨·····	李凤民	89
试论清入关前的衣冠制·····	王云英	92
从《红楼梦》谈满族服饰·····	王云英	97
满族饮食习惯小考·····	铁玉钦	102
信牌、印牌考释·····	铁玉钦	104
信牌印牌再考释·····	铁玉钦	110
后金时期的两种信牌·····	王明琦	113
对后金信牌的两点辨正·····	王明琦	118
清代东北采参业的兴衰·····	王佩环	120
清代雕刻简述·····	李仲元	125
论竹主题画的源流·····	李仲元	137
中国狮子造型源流初探·····	李仲元	145
浅谈狮形古钱·····	李仲元	154
高其佩和他的指头画《柳塘鸳鸯图》·····	王洪元	157

关于沈阳清故宫早期建筑的考察

铁玉钦 王佩环

沈阳故宫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者清太宗皇太极所建立的皇宫。它位于明代沈阳城（沈阳中卫城）的中心，在南北和东西城门两条直线交叉点的南邻（图1）。在旧城中心

原有中心庙。该庙恰在故宫的大政与崇政两殿之中的宫墙北面。它与南面的三官庙（即景佑宫）南北呼应，宫殿正置三宫与中心二庙之中，南北较短、东西狭长的旷地上；占地6万平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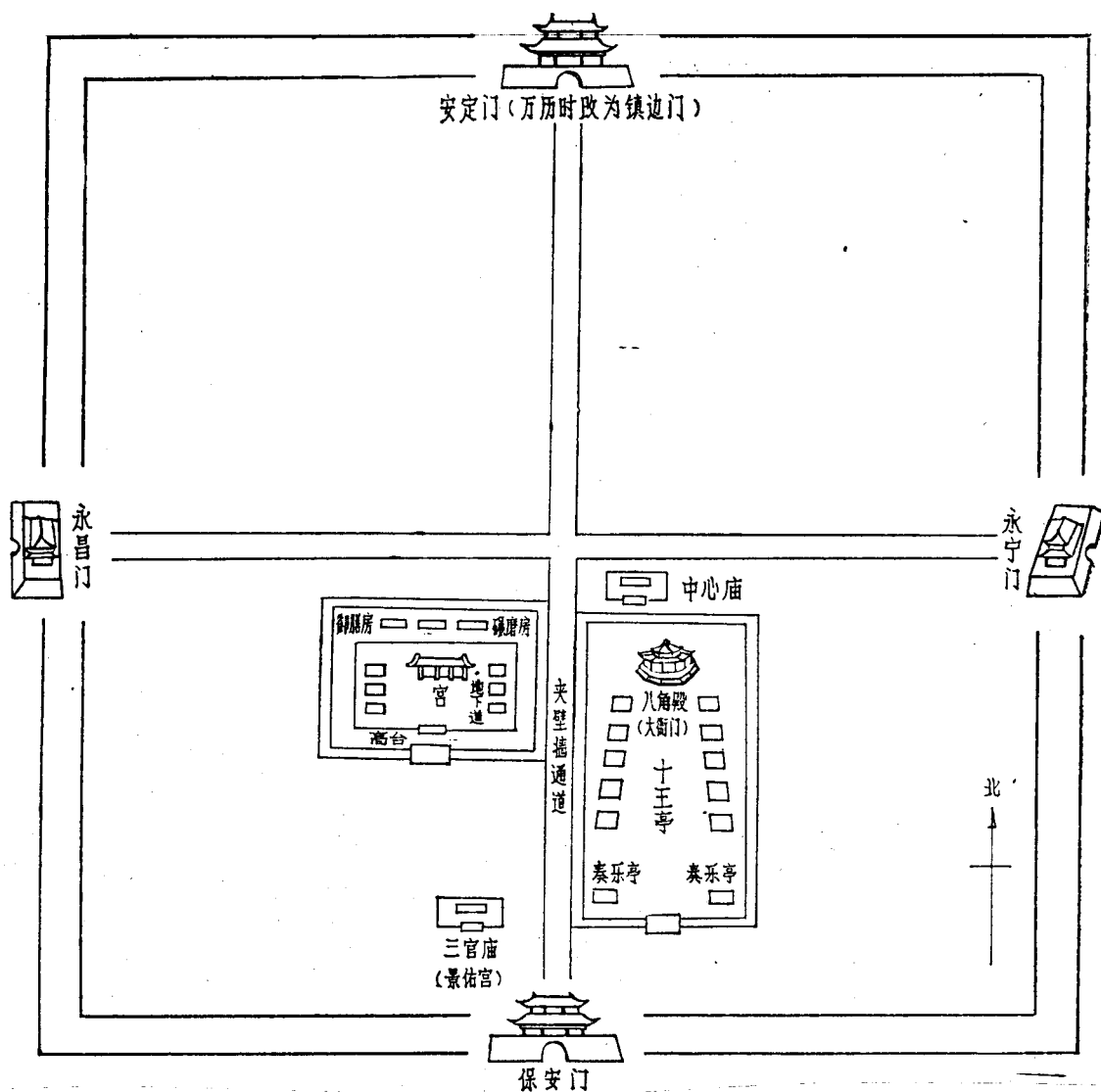


图1 努尔哈赤在明沈阳中卫城初建皇宫时的总体关系示意图

米。在全国的古建筑遗存中，它以满州民族特色最浓而见长，在宫殿建筑群中，也与北京明、清宫殿齐名、著称于国内外。它是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雏形的写照，是明、清两朝兴衰交替的历史见证。

沈阳故宫究竟建于何时？是历来人们争论的问题。长期以来，占上风的意见是故宫建于清崇德二年，即公元1637年。持这种看法的人颇多，包括清所修官书《盛京通志》等。入关后的清代皇帝也说：“大政殿崇德二年建。”^①，解放后所出的一些资料、文物宣传图录中，也有持这种看法的。所据除了清代《通志》之外，大约是故宫门前的文德、武功两坊上的落款年月^②。但也有人不同意此种意见，理由是：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崇德元年，皇太极登极改元即命了各宫殿名称，命名于先建筑于后，显然是不合理的。那么故宫的早期建筑究竟始建于何时呢？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1625年）即迁都沈阳，不能没有宫殿居住，尽管规模不大，或谓“草创”，总之应该是有建筑的，以此推论故宫草创于1625年。这一说法虽较前者近于合理，但无史料依据，因之说服力不大，不能被多数人接受。中外有些学者也做过类似的考证^③，但对早期建筑年代众说纷纭，均无确切结论。

本文想就此类问题，发表些浅见，以就教于中外学者。

一、努尔哈赤时期的建筑

沈阳故宫现有建筑七十余所，计三百余间共分三期建成（图2）。早期建筑包括：大政殿与十王亭、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和清宁、关雎、麟趾、衍庆、永福五官以及飞龙、翔凤二阁等。第二期建于乾隆早期，乾隆八年（1743年）有日华、霞绮二楼，师善、协中两斋；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至1748）为崇政殿东侧的颐和殿、介祉宫、敬典阁；西侧的迪光殿、保极宫、崇谟阁、继思斋等。第三期建筑为乾隆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此时增建的

西路：戏台、嘉荫堂、仰熙斋、文溯阁等。第二、三期建筑已有明确的时间记载，不在本文讨论之中，本文所论的只是东、中路的早期建筑。

沈阳故宫的最早建筑当推大政殿。大政殿在皇太极命名各宫殿名称时，叫做“笃恭殿”。此殿是八角重檐的木架结构。《清实录》记载命名时说：“大殿为笃恭殿”^④，可知大政殿一般称“大殿”，满文叫做amba yamun（汉译“大衙门”）。朝鲜世子李诊作质于沈阳，在他所写的《沈阳状启》中，也称此殿为“大衙门”^⑤），满文amba是“大”的意思，yamun即汉语的“衙门”的音译。大约满文中原没有“殿”这个词，后来称殿，是把汉文中“殿”这个音直接用在满文中，拼写而成“ ”（dian）。因为此殿呈八角形，所以在命名前也被称做“八角殿”或“八方亭”^⑥，但《满文老档》中，却没有“笃恭殿”这个名称。

努尔哈赤在公元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后，曾建过几处宫殿，最早是在今天新宾县永陵公社老城大队台地上所建的。其中称之为“金銮殿”的遗址，我们曾在五十年代做过发掘和测量，此殿与八角殿的建筑形式迥异，复原来看只不过是五间青砖瓦房，更没有使用琉璃瓦的痕迹。其次是界藩山和萨尔浒，两处情况基本上与老城相同。1621年，自萨尔浒迁到辽阳新城，由于后金进入了明代的辽沈地区，统治范围扩大了，经济力量已比先时为强，便在新城北部山岗上修了宫殿。我们在这里做过两次考查，所得琉璃瓦均为黄、绿两色，始知后金迁都辽阳后，才开始用琉璃瓦盖造宫殿。据《满文老档》记载，这里的金銮殿第一次被称作“八角殿”，它是沈阳故宫大政殿的兰本^⑦。天命十年（1625年）的三月，努尔哈赤突然做出决定：迁都沈阳。“三月，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大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官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帝不允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即可到；南征朝鲜，自清

沈阳故宫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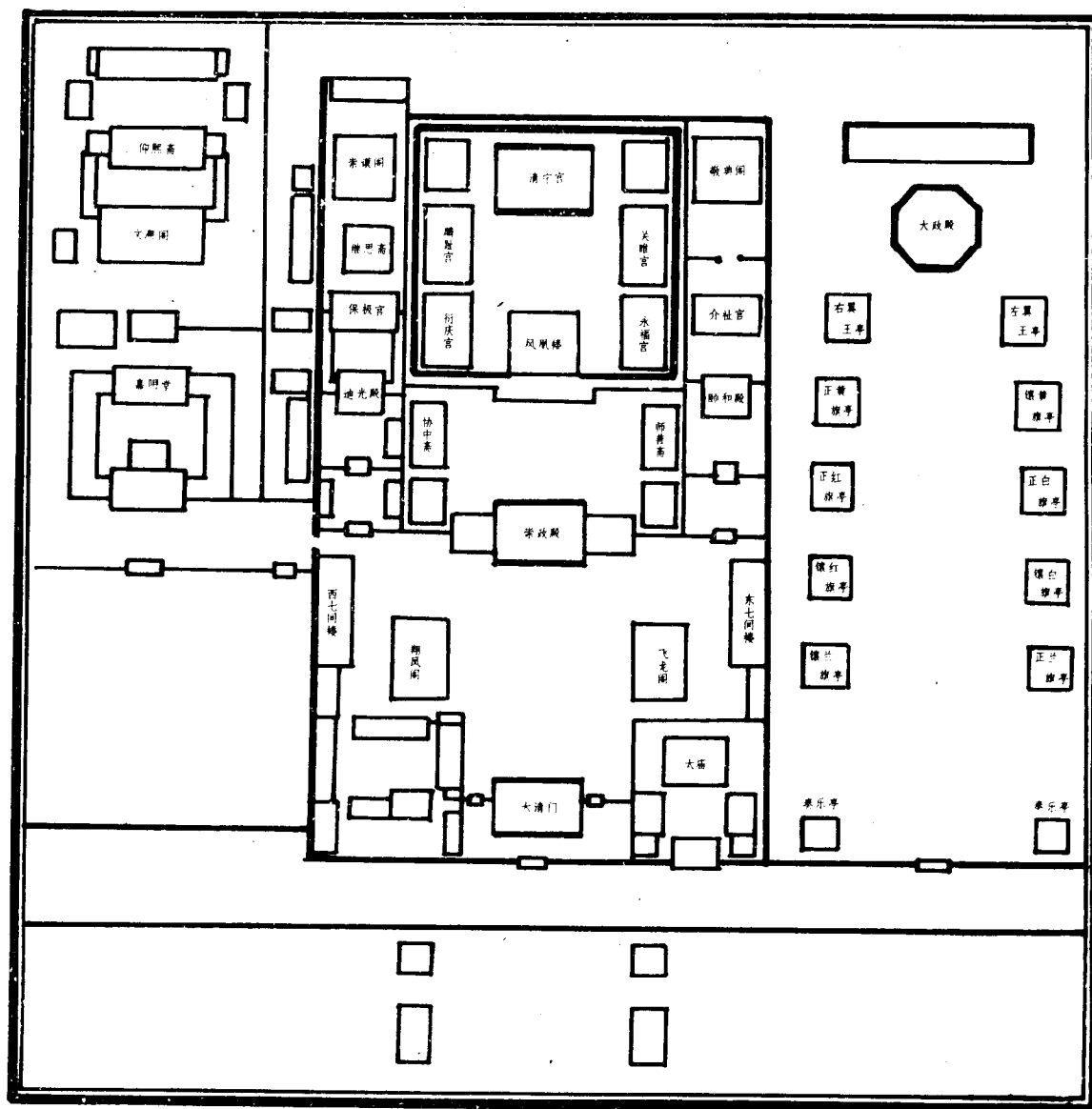


图 2 沈阳清故宫现状总平面示意图

河路以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木材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乃于三日出东京，宿虎皮驿，初四日到沈阳”^⑧。辽阳的宫殿大约最终建成于天命八年（1623年）六月^⑨。可是使用不久，即一年零九个月之后，又议迁都沈阳，而且决定的很快，三月初三日出发，初四日即到了沈阳，可见当时沈阳是没有盖宫殿的。那么故宫究竟是哪一年开始建筑的呢？《满文老档》有这样的记载，汉译为：“汗出自（八）角殿，杀四牛，治四十桌，大宴诸申（女真）、尼堪（汉人）、蒙古总兵官以下，千总以上……”^⑩。由于原档残缺，所记之事由不详，但时间为天命十一年八月一日。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据《清实录》载：天命十一年“秋七月癸巳（二十三日），上不豫，幸清河坐汤。八月庚子朔，丙午，上大渐欲还京，乘舟顺太子河而下，使人召大妃来迎，入浑河，大妃至。沂流至暖鸡堡，距沈阳城四十里。庚戌（十一日）未刻上崩，在位凡十一年，年六十有八。”这说明八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并不在沈阳，可是《满文老档》中却出现了努尔哈赤出八角殿的记载。为了说明情况，这里将《老档》天命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二日的记载全部翻译出来以备参考（《满文老档》是装订成册的并未散页）。

译文：“丙寅七月二十三日，上不豫，幸清河汤泉。八月初一日，钦命阿敏贝勒祈禱曰：皇考(ama)，儿汗因身染疾，恳乞皇考天之灵，佑儿速愈，何物可佑，俟儿痊愈，屠二牛，焚纸钱，遵皇考前言以祭之。再祭列祖列宗，保佑速愈等语。礼拜祈祷时，皇叔瓦尔喀、旺善、萨哈尔察（在侧？）……（原档残缺）

“（原档残缺）（汗）出（八）角殿，屠四牛，治四十桌，大宴诸申、尼堪，蒙古总兵以下，千总以上（官员）……（原档残缺）

“初二日，汗谕我们贝勒、蒙古贝勒曰：……

“本日（按初二日），汗勅书额克西额曰：‘曾言今即去，暂停，俟过本月初十再去所言

之处’。”^⑪

上述所引的《满文老档》原文是连续的，直到初四日，八月份的档子就全部完了。《满文老档》与《清实录》所记相互抵触，不知孰是？但《清太宗实录》卷一，天聪元年正月初一日，却记有“上御殿”的记载。皇太极在天聪元年正月初一日御殿，这个殿必建在努尔哈赤时期，因为一：既然是正月初一使用殿，那么决不会是这一天建成，正月初一以前必是天命十一年。二：努尔哈赤死于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八月距十二月仅有四个月。如果说天命十一年八月初一日《老档》所记无依据的话，那么十、十一、十二这三个月正入冬季，是不可能兴工的，况且沈阳地区冬季来临得早，怎能想见在滴水成冰的季节修盖宫殿呢？因此，皇太极在天聪元年正月初一所御之殿，必成在天命十一年冬季之前，也即九月之前。三：努尔哈赤做为后金国汗，他的死是“国丧”，成为当时后金的最大的、压倒一切的政治事件。处在国丧中的后金，一切礼仪均从免从减，甚至一直持续到天聪元年。《实录》载春节期间后金免去一切喜庆，都是因处在国丧期间。因此，决不能设想，国丧期中会大兴土木的。所以自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宾天起，处在国丧期中的后金不能施工建殿，那么皇太极天聪元年正月初一所御之殿，势必建在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以前。

总之，不管《满文老档》所记八月初一日努尔哈赤是否使用了殿，这个时候（天命十一年十二月以前）已建成了殿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殿便是与辽阳时期所建的八角殿模式上相同的殿，即沈阳故宫的八角的大政殿（图3）。

努尔哈赤时期的建筑，除大政殿外，尚应有“宫”（居住的地方），但这个宫究竟相当于今天故宫的那一座宫，则不可知。

在这一年里，不单修了宫殿，而且在城内还修了八旗大臣的住宅^⑫。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又接着修造宫殿，直到天聪六年完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三月初迁都沈阳后，即着手修



图3 大政殿

盖宫殿，最迟到了天命十一年八月（或者再晚一点），大政殿已经建成。在这个意思上说，沈阳故宫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至十一年，是完全有可能的了。

与大政殿相关联的建筑还有十王亭。十王亭在故宫东路与大政殿构成一体，呈“八”字形，东、西各五亭，排列在大政殿之南。除两翼王亭在最北稍向内突出的位置外，其余八亭依八旗之序而列。这种形式无论是在辽阳的东京城，或是在新宾、萨尔浒和界藩城都是没有的。在新宾的赫图阿拉，虽有八旗办事地点，但都是集中在城内的东南部，而不是在“金銮殿”前。辽阳的八角殿前也未发现八旗亭遗址。因此沈阳故宫的大政殿与十王亭独立成为一组“亭子式院落”建筑，是努哈赤迁都沈阳后的新设计。这种新设计与辽沈战役后，八旗地位的提高是分不开的。在此之前，努尔哈赤凡遇大事或设宴，都是“殿之两侧张天幕八，八旗之诸王、大臣于八处坐”^⑬，没有固定的建筑。由于八旗在战争中，已经成为后金的强大支柱，再加上以皇太极为首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人的封王和成为重要的军事将领，他们所辖的兵力很多，军权渐重，左右皇权的能力渐次增长，也构成了必须在大政殿前建立八旗办事机构的必要性^⑭。“高庙（太祖高皇帝，即努尔哈赤）抚定辽沈，集思广益，造亭于宫右，凡有军国重要，集宗藩于亭中，而量加采括，

名十王亭”^⑮。这基本上概括了努尔哈赤建造十王亭的用意。

由殿前临时设置的天幕，到固定建筑一十王亭的建在大殿之前，也是后金皇帝（汗）与王和八旗大臣会议的一个初创的典制。它有利于及时分析军情，采取应急的措施。到皇太极时期，又演变成八署（亭）办事和值班制，直至皇太极加强中央集权设立三院、六部之前。六部设立后，削减了八旗固山和王权力，十王亭也只剩下空架，单设值班官员等候皇帝召唤了。

二、皇太极时期的建筑

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的建筑，包括除东路之外的整个中路建筑。其南部直到今故宫大清门百米处的照壁墙和它以北的东、西各五间的朝房、奏乐亭、内三院（后为内务府，在今辽宁省煤田勘探地质公司院内）以及宫墙东、西的下马碑、西下马碑北的轿马场等均属同期建筑。崇德二年春又立了文德、武功二坊，（图4）并做了街门；至于堆子房，档房、肉楼、熬蜜房、仓廩、粉子房等也先后在同期告竣。

皇太极时期的建筑大体分为两期建成。主体建筑，即大内宫阙的建筑，包括大清门（图5）、崇政殿（图6）以及凤凰楼（图7）和台上五官（图8）的建筑完成于天聪七年；直到崇德二年（1637）完成了余下的建筑。



图4 武功坊

自天命十年三月迁都沈阳,直至天聪六年,中经七年左右时间,故宫的主体建筑都在紧张地施工中。这在《清实录》中有明确的记载,譬如天聪六年以前,所记皇太极的活动只是单纯的“御殿”、“还宫”之类,并未指明某宫、某殿^⑩。可见当时只有今之大政殿,官即清宁宫,其余的宫、殿、楼等尚未落成使用。可是到了天聪六年这一年,《实录》中的记载就变了样,宫、殿、楼、门等都出现了,为了区别殿的不同,还使用了“便殿”、“大殿”、“中殿”等字样。可见,天聪六年,现今之崇政殿已经落成,并加以使用^⑪。这里有几点是要加以说明的:

1· 关于“殿”的问题

这里提出了四个殿,即大殿、中殿、便殿



图6 崇政殿及右翊门

和内殿。大殿指的是今之大政殿,即皇太极时命名的笃恭殿、亦即《满文老档》中所记的“大衙门”。可是在沈阳故宫的早期建筑中,如今只保留下来两个殿——大政殿与崇政殿,而《实录》中却出现了四个殿,除大殿外,尚有中殿、内殿与便殿。我们以为这是三殿四名。中殿意思是中间的殿,前后或左右还应各有一殿,中殿是三个殿之中的第二殿的意思,这里指的就是崇政殿。便殿、内殿,从字义上看不是正规的殿,不做为日常朝会之用,是随意处理事务和休息的地方。“内”和“便”在意义上是相通的,“内”就是“便”。因此,“内殿”亦即“便殿”,这里应是一殿两称。譬如《实录》所记天聪六年正月赐代善、莽古尔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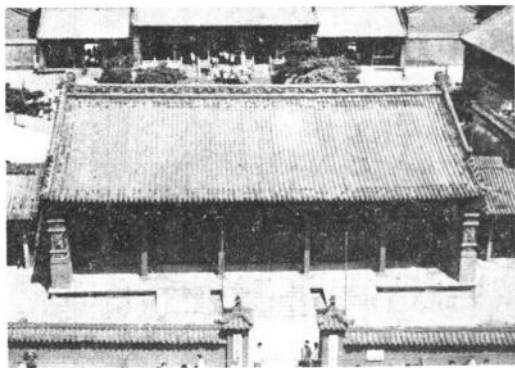


图5 大清门(前)、崇政殿及左、右翊门

衣帽,是讲弟兄间的礼节,不是以朝礼赐王公大臣,所以这个赏赐在便殿中举行,是“不拘常礼”之意,表示皇太极不摆皇帝架子,而是以弟待兄。其次一条是在内殿召见朝鲜礼部侍郎朴鲁。这虽是两国之间的交往,但在第一次征服朝鲜之后,后金与朝鲜订了兄弟之盟,后金为兄,朝鲜为弟,皇太极在这里召见他,也是为了表示与朝鲜的“兄弟”之情,是“一家人。”那么这里便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故宫今天只有两个殿,为什么还会出现三个殿呢?我们以为在皇太极时期是有三个殿的,除了大政、崇政之外,《满文老档》中还记有“北辰殿。”

北辰殿在《老档》中满文是hadahawusihai yamun,意即“北辰的衙门”。衙门后来通译为“殿”,即北辰殿^⑫。在《满文老档》中,大政殿、崇政殿、北辰殿曾先后出现,而在满文中写法也各异,如大政殿写做amba dasan i yamun,崇政殿写做wesihun dasan i yamun,可见北辰殿是另一殿,既非大政殿也非崇政殿。

在满文《黑图档》康熙八年“京来档”中,曾有“清宁宫前面两间房”的记载,这两间房在清宁宫之前,且为正房,到了这时,“已倒塌不存”,在随口附奏此房是否重建时,奉旨“停建,钦此。”(图9)这说明“清宁宫前面的两间房”建筑时间很早,起码与清宁宫和台上其余六宫建在同期,因此,到了康熙初,才倒塌不存了。由于清宁宫院内十分狭小,康熙八年重修清宁宫时,康熙皇帝才下旨“停建”。

后来连基础铲除，到今天，我们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清宁宫前面两间房”就整个方位来看，恰在宫殿之北，与大政、崇政两殿比较，也确在最后，且规模极小（只有两间），这可能就是《满文老档》与《清实录》所记的“内殿”和“便殿”的所在。因为它既在皇太极的寝宫



图7 故宫中路之凤凰楼

之前，下凤凰楼台阶又与崇政殿相毗连，是清太宗退朝之后处理日常事务的所在。因之，称为“内殿”（它在生活区之中）或“便殿”（并非朝贺出班之所）。然而，我们以为这个内殿与便殿的正式名称，便是“北辰殿”。《满文老档》崇德元年五月十四日记载说：“圣汗诞辰行礼，天亮前，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等以下、佐领以上咸集北辰殿，按品级排班毕，圣汗出，御北辰殿。”^④这里的北辰殿满文写做abkai hadaha wusihai yamun，直译成汉文为“天上不动的星的衙门。”满文译北斗星为“天上的不动的星。”北斗在天际之北，这里用以名最北的内殿或便殿。而“清宁宫前面的两间房”恰在整个宫殿的最北部，在规划位置上与北辰殿相合，在使用上也与便殿、内殿相附。如此，通过《满文老档》、满文《黑图档》的记载，可以推知北辰殿的用途了。

北辰殿座落在崇政殿之后、清宁宫之前的中路的中轴线上，是清初的重要建筑之一。它是作为便殿或内殿使用的。因此，《满文老档》中，记载了若干官员、戚属召入清宁宫院内赐宴或行礼的事。这些活动都是在北辰殿前进

行的^⑤。北辰殿因为是便殿和内殿，使用虽繁，但殿堂狭小，又非正殿，所以崇德改元并未命名，多不为人所知。大约在太宗末世祖初便废置不用，渐行塌毁，到了康熙初年，圣祖便降旨“停建”。此后，便不复存在了。

其次是关于“大政殿”的名称问题，大政殿在崇德元年命名时，被称“笃恭殿。”笃恭殿一词除《清实录》外不见于他书记载。《满文老档》从无这一殿名，而只提“大政殿”。至今故宫东路的大殿门额题为“大政殿”。设若皇太极时定名为笃恭殿的话，为什么《老档》却偏无此名。乾隆重题的匾额仍书“大政殿”，可见如不是《实录》误记，“笃恭殿”一名，起码也未被正式采用过。有人认为大政殿是康熙时期更的名，不知其之所据。但我们认为大政殿到了崇德改元之后，已被称做“大政殿”，其名改在皇太极时期，而不是康熙时期。玄烨（康熙）是不大可能擅改其祖父时期已定的殿名的，况且入关后，只是“东巡”才暂短地使用一下大政殿，擅自更名是不遵祖制。清入关后，较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敬天法祖思想也极浓厚，因此，“笃恭殿”康熙时期更名为“大政殿”之说似不可能。同时，在《满文老档》中已出现了“大政殿”这个名称，满文是ambadasan i yamun 汉译“大政的衙门。”在《满文老档》中，没有提起过“笃恭殿”这个名称。

2. 关于楼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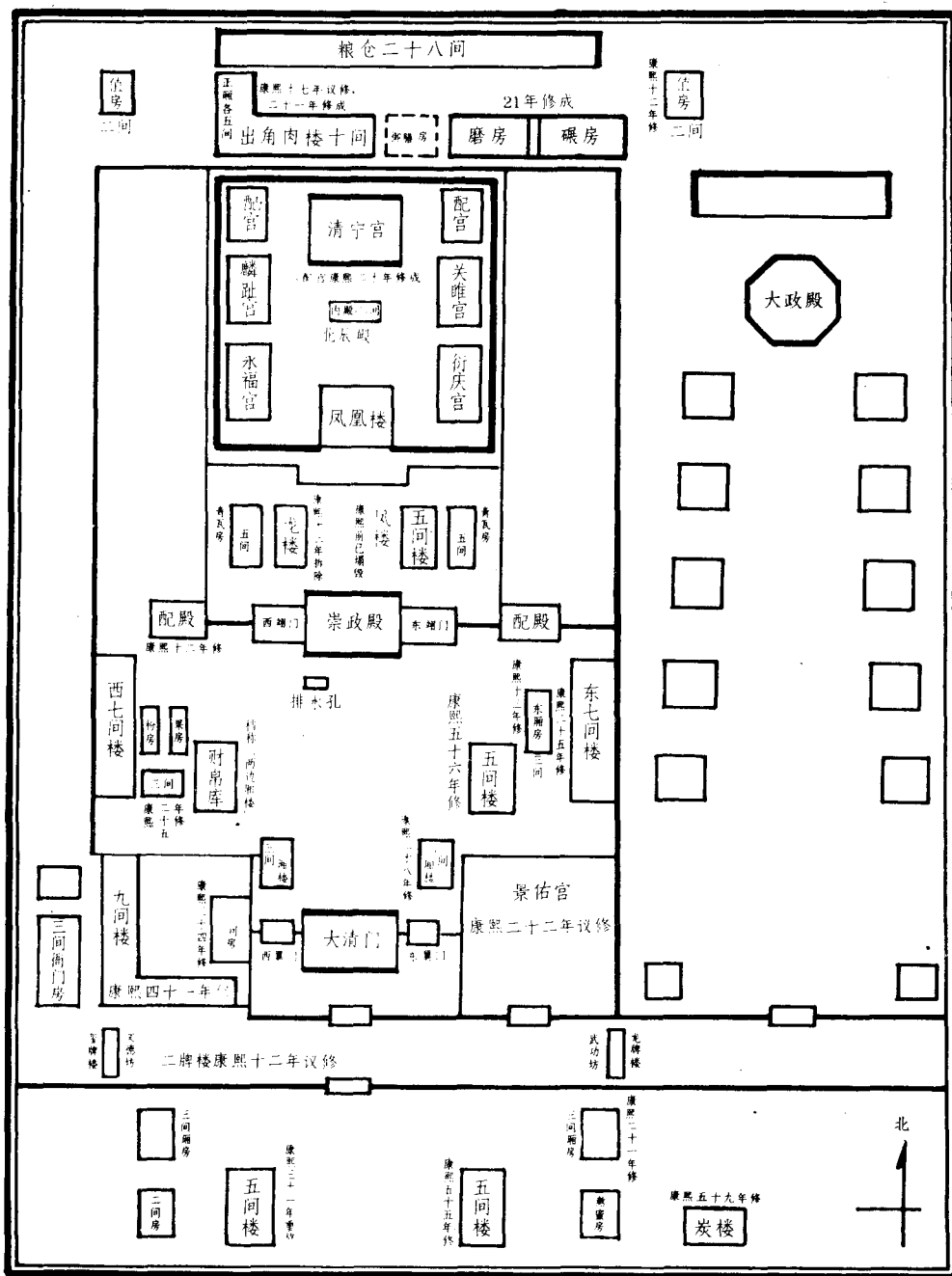
凤凰楼是沈阳故宫主体建筑之一，对其建筑年代的考证问题，过去中外学者众说纷纭莫



图8 清宁宫及宫前之索伦杆

康熙三年——五十九年（1664—1720）

满文《黑图档》所载沈阳故宫修建示意图



- 注：1. 此图依辽宁省档案馆藏满文《黑图档》所示方位添划。
2. 原档无御膳房，虚线框内为推想。
3. 北辰殿系据《满文老档》、满文《黑图档》所示方位印证。
4. 满文《黑图档》系清官府间之内部公文往来，因之，只按习惯直呼某建筑，如^{ᡩᠠᡳᡳᡳᡳᡳᡳ} (Muduri leose) 等。
5. 白框内未添入名称者，系档中所未提及。

衷一是。《清太宗实录》天聪十年四月命宫殿名称时，对楼的命名是“台东楼为翔凤楼，台西楼为飞龙阁”，并未提及凤凰楼。而许多人则以为“大政殿、崇政殿、清宁宫、大清门等是崇德二年建。”那么凤凰楼就更当晚于上述建筑，所以有人便推测凤凰楼系康熙年间所增建的了。日本伊藤清造在《奉天宫殿之研究》一书中也将凤凰楼的建筑列入第二期，即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三年（1644—1684）间所建。那么，凤凰楼到底是早期所建还是康熙年间所增建呢？凤凰楼与翔凤楼是两座楼还是同一座楼呢？《满文老档》和满文《黑图档》为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凤凰楼与清宁宫、大政殿、崇政殿、大清门等确属早期建筑，当在天聪十年前即已建成。尽管《满文老档》有些残缺，具体准确建成年代似不可考，但《满文老档》中崇德元年清宁宫、大政殿、崇政殿、大清门、翔凤楼、凤凰楼、北辰殿等宫殿名称已全部出现，且多次使用，说明上述建筑早在崇德元年前就已建成当无疑问。

关于凤凰楼，《满文老档》崇德元年五月有如下的记载，汉译为：

“二十九日，圣汗遣征明朝，御翔凤楼下……”

崇德元年六月条

“圣汗于翔凤楼昼寝，梦与皇后向东行（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一殿……。”

崇德元年十一月条：

“十三日，圣汗集众亲王、郡王、贝勒、固山额真，都察院官员，汗御凤凰楼下，诏弘文院学士诵读《金国五世世宗兀鲁汗实录》……。”

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崇德实录稿》记载说：

“是日，皇帝因兴兵征明，御翔凤阁”。但由于多年习惯称“楼”，《实录稿》中，同年同月条下仍书“楼”。但“翔凤楼”并非《实录稿》误记，如六月初六日，“是日皇帝在翔凤阁昼寝，梦中同皇后往至一衙门……”，也记的“翔凤阁”。

从以上记载足以说明上述建筑皆系皇太极时期的早期建筑，最晚到了崇德元年即已陆续

使用了，凤凰楼也在其中。凤凰楼满文为 fung huwang lose，同时《满文老档》也提到了翔凤楼，它的满文叫做 deyere fung huwang lose，即“飞翔的凤凰的楼”。说明当时，翔凤楼和凤凰楼是同时期存在的两座楼。《满文老档》中未见到“飞龙阁”这个名称，这可能因《满文老档》残缺不全所致。可是满文《黑图档》中记有 muduri lose 即“龙楼”这样一所建筑，从对称的角度译成“飞龙楼”，“飞龙阁”亦无可。因为《黑图档》属于内部各衙署间往来行文，在称谓上比较随便，简称“飞龙阁”为“龙楼”也有可能。如康熙三年六月十九日“自总管内务府转盛京工部”为题，请修缮清宁宫等处回文内称：“顺治十七年六月来文，即著修缮清宁宫、凤凰楼、龙楼、崇政殿”。并有康熙谕旨：“大政殿著尔部修缮；清宁宫、两边配宫、凤凰楼、大清门、崇政殿，著内务府出力修缮；将龙楼拆掉，余料修缮时酌情使用”。在这两处都明确提到了“龙楼”。同时似乎表明凤凰楼、龙楼与清宁宫等皆系同期建筑的主体工程之一，到顺治十七年已年久待修了。由此可以看出凤凰楼的建筑年代当为皇太极时期，而并非康熙年间增建。同时翔凤楼、龙楼（或称飞龙阁），亦当为同期建筑。凤凰楼的建筑年代不难确定，问题在于皇太极在宫殿命名时是“台东楼为翔凤楼，台西楼为飞龙阁”，是以“台”为基准的。《满文老档》中凤凰楼、翔凤楼同时出现，说明台上已有楼，即今之凤凰楼。那么飞龙、翔凤应在台下，也就是在凤凰楼下的东、西两侧，即今师善、协中两斋的位置上。飞龙阁和翔凤楼也就是一龙楼、一凤楼，这很合乎封建帝、后常以龙、凤自喻的逻辑。而且从记载中知道，皇太极曾多次使用翔凤楼；《努尔哈赤实录》成，也放在翔凤楼内。大约满洲帝王也以东为上，（早期满文文献中称“东”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只是把“凤”放在上首。因此，就特别喜欢使用翔凤楼了。

至于高士奇在他所撰的《扈从东巡日记》中所说：“台上楼为翔凤楼，台下楼为飞龙阁”，

可能是误解。因为当高士奇到达盛京时已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此时龙楼（即飞龙阁）已被拆除八年之久了。据满文《黑图档》载，龙楼在康熙十三年后被拆除，因此台下确实只剩下一楼，但这一楼并非是飞龙阁——龙楼，而是原来的东阁楼，也即翔凤楼。高士奇所说台上楼为翔凤楼，其实应是凤凰楼。

实际上，在康熙十三年后，龙楼（飞龙阁）已被拆除，后来翔凤楼也不复存在了，只剩下崇政殿前的东、西厢楼。乾隆年间在重题门额时，题这二楼为“飞龙”、“翔凤”，而且颠倒了东、西位置——东厢名“飞龙阁”，西厢楼名“翔凤阁”。

3. 关于门的问题

《实录》中所纪门较多，如“御东门廊下”，这指的是崇政殿东的左翊门。又如莽古尔泰死，皇太极“坐于正中侧门下……，于中门内设帷幄守丧”，这指的是大清门和大清门侧的东、西翼门。满珠习礼等蒙古喇嘛至，皇太极“皆入至中门下”，指的也是大清门。“五月（天聪八年）上召诸觉罗入庭赐宴，上通于内庭门”，内庭门即凤凰楼下通道的门。天聪九年九月条的皇太极怨代善接待哈达公主（莽古尔泰之妹，也称莽古济格格），“闭大内门”或“复闭朝门”之门，指的也是大清门。“内庭门”或“内门”均指凤凰楼下通道的大门；“大内门”等均指大清门。天聪十年四月命宫殿名称时，只命了大清门及其两侧的翼门，如“大门为大门，东门为东翼门，西门为西翼门”，其他如内庭门、东、西翊门，均未列入命名之中。大清门是故宫的正门，满文写作daicing duka，“大清”二字是从汉音音译的。

4. 关于宫的问题

故宫的早期建筑中，“宫”只有五个，即清宁宫、关雎宫、衍庆宫、麟趾宫、永福宫。

《满文老档》中，清宁宫被写作geng giyan elhe boo，是“清宁的家”，而不是“宫”。后来乾隆时期，弘历重新写各宫殿门额时才将boo改作gung，借用了汉字中的“宫”字。皇太极时，各宫及妃子的排列顺序按《满文老档》

是：“关雎家的大夫人”（即关雎宫宸妃）麟趾家的贵大夫人”（即麟趾宫贵妃）；“衍庆家的淑夫人”（即衍庆宫淑妃）；“永福家的庄夫人”（即永福宫庄妃）。可是目前故宫的门额顺序却是：东为关雎、永福；西为麟趾、衍庆，这与早期顺序不同。永福与衍庆调了位置。查《清实录》所记也与《满文老档》相同，其中定各宫名条说：“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②0}，直至入关，各宫位置并未变动。这里永福与衍庆位置之错，是乾隆重题门额时弄错或有意更换的。

5. 关于“夹壁墙”的问题

在故宫东路与中路之间有一堵夹壁墙。这堵墙由北向南穿过故宫，此自明代安定门起，止于故宫南面的东西大街。这堵夹壁墙中宽五米左右，可能是明代沈阳中卫为“防虏”而建的屯兵之所。后金迁都沈阳后，仍然利用它做为由城外回城再回宫的专用通道。但夹壁墙在故宫通过的中段，在营建沈阳故宫时开了一个门，使东、中两路相通。这样一来，通过故宫的夹壁墙，可利用的部分只剩下了北面一段，门南部约十丈即三十三米基本废之不用了。

1978年10月23日，沈阳故宫古建工程队在拆除南段夹壁墙时，在距今月亮门（即夹壁墙通过故宫全段正中处）以南10米处，在外墙的正中心发现建墙时所扣的青瓦一片，四周用立砖与他砖隔开，瓦上再覆一瓦，凸面朝下，该瓦上有墨书字迹，五行三十一字，第一行七字，二行七字，三行七字，四行八字，五行二字，自右至左竖书，其文为：

此墙两面南北共
长拾丈保固在（再）有
北墙碎修粉灰无
有保固同坚（监） 工人员
看准

标点后的原文应是：“此墙两面，南北共长拾丈，保固。在（再）有，北墙碎修、粉灰，无有保固，同坚（监）工人员看准！”该瓦长16、宽13、厚1.3厘米。从字体上看较工整。依瓦的

记载对照实物来看,该墙南段长30米,正合十丈(而不是“南北共长十丈”);十丈以北确为碎修,拆墙时,十分明显地看出北段是用碎砖乱瓦填心,外表用粉灰抹成,而其余部分则是完全用青砖咬砌而成

此瓦应是修建时,限于材料等条件,议定墙的南、北二段做法不相同。为明确责任,标明哪段是“保固”的,以便出了问题时据以验证。

三、关于建筑材料的来源问题

这里所谈的故宫建筑材料来源,主要想谈一谈琉璃瓦件的来源问题。至于木材,《实录》中已讲得很清楚“沈阳浑河通苏子河,于苏子河源头处伐木顺流下,木材不可胜用”^①，“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②。可知故宫的木材来自苏子河上游,即今新宾、桓仁一带,是没有多大问题的。石材,经鉴定,基础和石栏多使用“红小豆石”,这种石材产自辽宁省本溪市桥头一带,俗称“本溪红小豆石”,可见石材多自辽南一带采来。但是由于建筑匆忙和运石路程太长,用量较大,所以在建筑中,也适当地搞了“废物”利用,例如我们曾发现崇政殿前后石阶的条石就是用了明代旧石碑,铲平一面铺成的。1979年10月27日,故宫古建筑工程队在翻修大政殿前御路时,发现铺御路的青板石背面有双钩篆书碑一块,残长100、宽76、厚16厘米,共刻字七,为“戴府重修先莹记”,款识已失。可知这是一个戴氏家族为其祖先立的墓碑,也被运来铺了御路。按其迷信,这是阴宅秽物,然而却铺在了御路上,可见当时石料之短缺了。

琉璃瓦件,是建筑宫殿的重要材料。后金虽占领辽东地区,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十分激烈,手工业工人大量逃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用琉璃瓦件建筑皇宫,困难极多,所以一段时间里,曾传说故宫琉璃瓦是由关内偷运来的。此说乍听似乎有理,细嚼却觉十分荒唐,

因为沈阳故宫的建筑有别于北京,大部分瓦件必须严格按尺寸定制,在天命十一年前后,即明天启五年至六年正是明、金对峙时期,无论水、旱任何道路都是不通的,况且这种建筑材料并非民间所用,只有皇家才能用的专有材料,怎么可能从关内运来呢?为了解决沈阳故宫琉璃瓦件的来源问题,我们曾先后在辽宁境内对后金的所有“宫殿”作了调查,特别是在对辽阳新城八角殿遗址的调查中,发现了大量的琉璃瓦件,多为黄、绿两色。新城八角殿很可能是与今之大政殿等建筑用黄琉璃瓦绿剪边的情况相一致。其中绿瓦的颜色、质料极象沈阳故宫收藏的努尔哈赤时期海州所贡的绿釉瓷器,根据这个线索,我们于1973年6月调查了海城县析木公社缸窑岭的黄瓦窑。1979年秋,我们再一次到这里,由于窑室破坏甚剧,我们只解剖了早期灰坑,所得窑具,绿釉瓷片、琉璃瓦件甚多。

黄瓦窑座落在辽宁省海城县东南三十五里,缸窑岭迤东二里的岩山山脉的山坳中,距海(城)岫(岩)公路一里许。1973年时,这里布列着八座窑址除六座面目皆非外,剩下的两座尚能看出部分砖砌的窑壁和圆形窑顶。这儿,在方圆十几里的社员家山墙和屋脊上都装饰着大量的琉璃瓦件,辉煌夺目。有的瓦件上,清晰地刻着“大清门”、“永福、衍庆宫”,“配殿”、“昭陵角楼”、“永陵碑楼”、“大殿”等字样。可以肯定这里在清中、晚期确实为三陵(永、福、昭)和故宫烧造过琉璃瓦,当无疑问。据《海城县志》载:“城东南三十五里,在岩山山麓有黄瓦窑,制黄绿琉璃瓦。清时工部特派五品官监制黄瓦,以备陵寝宫殿之用。”但是黄瓦窑究竟建于何时,规模若何?这些问题经过调查,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我们调查了一位清光绪时在窑上画作里作过工人的候启性老人(当时八十三岁),他说:“我听说,有汗王就有这黄瓦窑了”。这个传说说明,它很可能始自努尔哈赤时期,接着我们又在山腰一户刘姓人家的门前,发现了一幢乾隆五十一年(1746)的《重修五神庙碑》。碑文记载

乾隆五十一年《重修五神庙碑》。碑文记载说：“我县东南缸窑，旧有古庙一所，伯灵、火神、山神、土地，建自前明。至我朝改为黄瓦窑后，立窑神，故曰‘五神庙’。”这说明五神庙原为四神庙，是明代所建。入清后，当在乾隆以前改为五神庙，这是因为设窑的结果。查《满文老档》天命六年记载说：“六月初七，海州城属地析木城之村人做三千五百一十只绿碗、罐子送来。其日汗曰：谓东珠、金银为宝者，其算何宝？寒冷之时可当衣穿？饥饿之时可以食乎？国家所养之贤良人，乃能识国中不识之物，造不能造之物之匠人，才是真宝也。今自析木城处送来绿釉子光碗、盆、大瓶子，是对国家有用之事矣。可给此匠人官职乎？赏以财帛乎？敕书令都堂、总兵、道台、副将拟议回奏。……自析木城送绿碗、罐、盆子之人因其制造于国家有用之物，赐与守备职，赏银二十两。”由此可见明代这里就有窑，而且在努尔哈赤占领海州后，这里管窑人即投降，并为后金烧造瓷器（《老档》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条下记“送来绿碗、小盆一千五百……”）。管窑人为侯姓，《海城县志》在《重修缸窑岭伯灵庙碑记并序》中说：“清初修理陵寝宫殿，需用龙砖彩瓦，始由千总侯振举采访北地之土，可制琉璃瓦；因赏振举世袭盛京工部五品官，管理黄瓦窑，监督带领之，催匠役壮丁烧造琉璃瓦，以备修理陵寝、宫殿之用”^③。这里所说的“千总侯振举世袭盛京工部五品官”与努尔哈赤赏给“析木城之地造绿色罐子送来之人”是一个人。努尔哈赤赏给他守备官也是五品，和侯氏世袭五品官相同。碑文中说：“盛京琉璃厂旧有伯灵祠，建者不知其何年，相传以为肇始于明云。我皇帝定鼎以来，念我侯氏微勋，爱命我先祖职考工之分司，为此祠凭依，卑得食邑于兹，世守勿替，迄今八世十有四任焉，是知我皇宫之永壮观瞻也。”这一段说得十分清楚，即一、黄瓦窑原名“盛京琉璃厂”；二、侯氏到了侯庭弼（碑文主人）时（咸丰辛亥一八五一年）已经八辈为官，并作了十四任；三、是皇帝定鼎时（并非定鼎中原，而是统治全东

北时，也就是努尔哈赤时，“爱命我先祖”“卑得食邑于兹（析木城）”，“世守勿替”的。这说明，到了咸丰元年，侯氏已经当了八辈子十四任五品官。假定侯振举为第一辈，侯庭弼为第八辈，中间经六辈十二任。设一辈为三十年左右，即由咸丰元年上溯二百四十年左右，恰好是努尔哈赤时期，那么这个窑所谓的“清初”正是指后金进入辽沈之时，与《老档》对照来看是附合的。“八世十四任”说明有的一世可以两任或数任，如《海城县志》乾隆五十八年《重修金塔大禅宝林寺碑记》中，就有“我朝乾隆四十五年，五品官侯瓚与周方重为补茸”的记载。到了乾隆五十八年，时隔十四年又记有“五品官侯敬不忍坐视，同合会人等立愿重修”字样。侯瓚与侯敬是一辈，十四年间侯氏已经两任五品官。认定侯振举是努尔哈赤时期“送绿色罐子的人”，还有一条根据，即《海城县志》卷二“民族”中，有这样记载：“侯氏，原籍山西明福县，后徙本境。清初隶汉军旗，世袭盛京五品官，监造黄瓦，族繁户众，世居城东南析木城”。这说明侯氏隶汉军旗，当在入关之前，正与努尔哈赤时之侯振举相同，“世居析木城”的侯氏，也正是送绿釉罐子之人。

陈万里先生在《谈山西琉璃》中说：“我们知道，北京烧琉璃的赵家以及沈阳的侯家，都是山西人（赵家据说自元代从山西迁来，初在海王村（即今之琉璃厂，后迁门头沟琉璃渠村）承造元、明、清三代陵寝坛庙。侯氏承造沈阳宫殿陵寝，烧造地点在海城县缸窑岭。说是明万历三十五年从山西介休县贾村移来（见《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期）”^④。陈万里先生的调查提供了极重要的证据：即沈阳故宫、陵寝的琉璃是山西侯姓在海城缸窑岭所烧；侯姓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入辽，因此辽阳八角殿和故宫的琉璃正是侯姓所烧；也是烧造绿釉罐子的主人。这与我们上述的调查和《海城县志》所记是“不谋而合的。”

我们在缸窑岭调查的同时，对早期窑址打了小型探沟，未见清初琉璃瓦残片，但在采集

和解剖早期灰坑中，却得到了一些早期绿釉瓷器残片、建筑瓦件、窑具等。这些瓷片和琉璃构件无论在颜色上、火候上都与辽阳八角殿和故宫早期琉璃瓦一模一样。至此，可以说：海城析木缸窑岭是故宫建筑时琉璃瓦件的唯一来源。

黄瓦窑的规模，据已知材料，大致如下：

甲、乾隆时期

领催一人（侯功煥） 官厅三间 塑匠二人
颜料库一间 瓦匠五人 办事人十四人 大窑五座
工人宿舍五间 琉璃照壁一座 筒瓦匠十二人
百总三人 仙人祠一座 琉璃匠五人 厂房七十至八十间
铁匠七人 木匠一人 总计人五十 房八十至九十间 窑五座^②

乙、咸丰时期

领催一人（侯庭弼） 工人数不详 房舍除工人宿舍七八十间已塌外，余者均存^③

丙、道光时期

领催一人（不详） 厂房百余间 作坊四个（画作二十人左右、瓦匠、木匠、小工百余人左右）工人宿舍二十余间^④

丁、光绪、宣统时期

领催一人（侯济） 工匠三十七人 办事、零工和官厅人员共二、三百人^⑤

戊、努尔哈赤及皇太极时期

领催一人（侯振举） 工人百余名 窑五、六座^⑥。

烧造琉璃瓦件所用的原料来源

据《海城县志》载：“瓷土，一名陶土，俗称白土。其质极细，由正长石分解而成为硅酸矾土，有黄、白、红等色。白色者为贵，为制造瓷器必需之原料，本境山中多产之”^⑦。咸丰元年《重修缸窑岭伯灵庙碑记并序》中也说：“山产红土、白土、赤石、马牙石，可制琉璃砖、瓦”。据在析木公社窑上当过画工的七十四岁（1973年时）老人罗清印说，当时制琉璃瓦的原料用铅、章丹、白马磷石、锡、长石、铜、铁，共七味。

黄瓦窑的管理

自侯振举献绿釉瓷器之后，黄瓦窑即为侯

氏一姓管理，从侯振举中经侯瓚、侯敬、侯庭弼、侯功煥直至侯济；即由天命至宣统，十二帝二百九十一年（公元1621—1911年）经历了清朝的始终。侯氏因献瓷器、修宫殿、陵寝有功，世袭五品领催，侯氏家族一直藏有清朝所发的敕命^⑧，他们凭借着统治特权“食邑”于析木，成了析木一带最大的剥削者，窑上除侯氏领催之外，下设百总、办事人、账房先生等层层剥削和压迫广大窑工。广大窑工“日出而做，日入而息”，他们的食宿集中在窑地上，没有假期，除红、白事情及每年四月十八娘娘庙会外，都必须在窑上干活，吃粮由官库所供“仓米”——小米、高粱米。童工的生活更惨，他们负担着筛土、出窑等大量繁重工作，工资只有成人的一半。窑上除了供五神从精神上麻痹统治工人外，还设有很多刑法惩治工人。

四、早期建筑的特点

故宫的早期建筑有着它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民族特色。这个民族的特色同时还兼蓄了汉民族传统的建筑工艺。因此，严格地说，故宫的早期建筑，是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反映在建筑艺术上的文化溶合。也可以说是从单一的女真族走向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即满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与以八旗制为轴心，具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状态、共同的心理特征的集团——“旗人”，这个特殊阶层的出现，是当时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产物。

故宫的早期建筑，因袭了东京城（辽阳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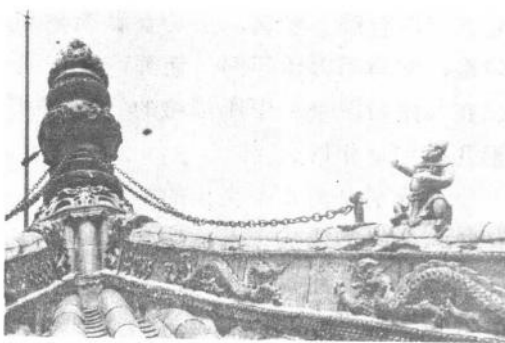


图10 大政殿琉璃宝顶，垂脊脊上有蒙古力士

城)的宫殿建筑模式并略加发展而成。在琉璃的使用上,不纯用黄瓦,而是黄琉璃瓦绿剪边。琉璃起源较早,据《魏书》记载北魏便有琉璃了,唐代在建筑上已经出现了青瓦屋面绿琉璃剪边的做法,这是由于琉璃造价较高,难于制作的结果。元代在宫廷建筑上喜欢用多种色彩的五彩琉璃,沈阳故宫的脊、墀头也多用几种色彩的琉璃(图10),这大约是受元代建筑的影响。十二至十三世纪女真族所建的金王朝,在宫殿建筑上也多用黄、绿两色琉璃,如黑龙江省的白城是金上京的故地,如今在这个遗址上,仍可以见黄、绿两色琉璃瓦,这里的建筑很可能也是黄琉璃瓦绿剪边。清初,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都十分尊崇金朝,效法金世宗,因此,沈阳故宫的黄琉璃瓦绿剪边、彩脊等受金、元影响是无疑的。而明代的宫殿建筑纯为“一堂黄”(如北京故宫琉璃瓦纯用黄色),这是以黄色为至尊的结果。

琉璃是中国独特的装饰材料,在宫殿建筑上,它把装饰和实用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为中国建筑史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沈阳故宫的两座主要大殿(也是这座故宫如今仅有的殿),在宝座之前的堂陛(崇政殿)或殿前两个主要檐柱上(大政殿)均有形体较大、姿态生动的龙。在宫殿建筑上,以龙做为皇帝的象征且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这是继承汉族的传统,但是这里的处理则显得有些过分写实和土气。这表现出在宫殿建筑上缺乏楷模的原始性。大政殿内藻井也有坐龙木雕,并有“万福祿寿喜”的汉字图案装饰(图19)。

凤凰楼高台之上是后妃生活区,它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建筑,正是女真族早期的生活习俗,它与明万历年间,朝鲜南薄主事申忠一,在《建州图录》中所描绘的“奴酋家”的情形几乎完全相同。

下面分别谈谈几个突出的特点:

1. 多民族建筑艺术的融合

大政殿是八角重檐建筑,从柱廊式、木结构、斗拱、降龙藻井等看,纯属汉族建筑,师承于宋的《营造法式》。其中火焰珠顶、须弥

座式台基、脊上的鞑人、天花上的梵文装饰,又是蒙古族和喇嘛教的建筑艺术。其八角代表八旗制度、木桶扇窗、门,窗户纸糊在外等又是满族的传统建筑方式。丹墀与地面一平、仅用条石镶边以示区别,又是别出一格的,既不同于汉族的传统宫殿建筑形式,又是因地制宜的新创造。大政殿汉、满、蒙合一的建筑形式,反映了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多民族国体的奠定。努尔哈赤对后金的强邻蒙古族的争取和对明军汉官的拢络,都是要达到壮大自己,削弱敌人,以便于将为数较少的女真人的统治变为有更多被统治者的支持的目的。并以建立汉、蒙八旗为组织手段,将各族化为一个共同体,便于贯彻政令,统一指挥,出征能战,解甲能耕。因此,反映在大政殿建筑上,也采用了三族合一的建筑手法。

大政殿的建筑在政治上反映了清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雏形——女真、蒙古、尼堪的合一;在文化上,反映了各民族优秀的建筑艺术的综合技巧。它是目前国内宫殿建筑群中,独具民族风格的代表作,是汉、满、蒙各族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各民族能工巧匠微妙地将各族艺术融合成一体杰出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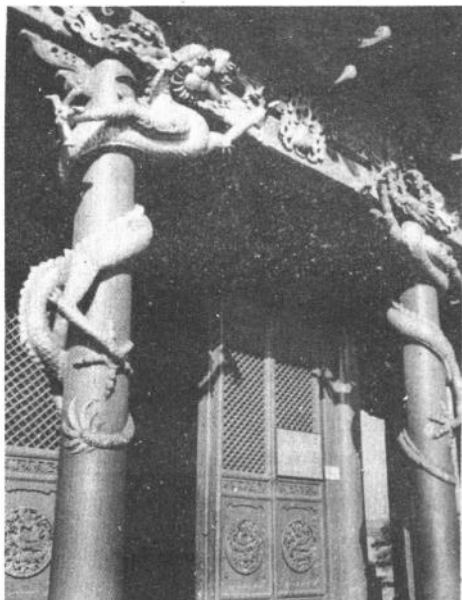


图11 大政殿门前之双龙蟠柱

2. 高台建筑

沈阳故宫在宫与殿的建筑处置上与北京故宫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即沈阳的宫高殿低，北京则反为殿高宫低。沈阳故宫的后妃生活区（即宫），全部建筑在3.80米的高台之上，前有凤凰楼为门，四周有高墙围绕，单独成为一个城堡，而殿却置于平地上。反之，北京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居于高台之上，后宫却在平地上。我们以为这是女真族长期生活在高山之上，是山地民族习俗的结果。有人以为女真族与蒙古族接近，且有清一代常联婚姻，生活习俗必相近，其实不然。蒙古族是草原民族，生活、生产以牧放为主，逐水草而居；女真族早已知道稼穡，过定居生活，且常挖参于高山之上，围猎于峰壑之间，纵马奔驰，追杀野物，丘陵、山谷是女真族纵横驰骋的大舞台。清人自称肇始于长白山，也证实女真族确是山地民族，与蒙古族以草原为基地是截然不同的。从建州卫的建州老营到赫图阿拉山上，从萨尔浒山城到界凡山城，直到辽阳东京新城都把居住区建在山上，而且还堆起了高台。到了沈阳之后，在宫殿修建中，仍将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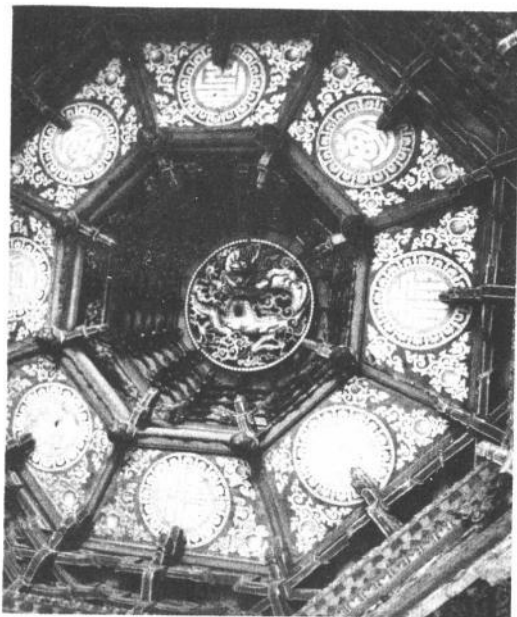


图12 大政殿内天花藻井

住区建在高台上，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惯了。

非但皇家的后宫建在高台上，就是贝勒大臣家的住室也如此。如天聪七年十月，济尔哈朗福晋薨，《实录》记载说：“己亥卯刻，上率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临其丧，贝勒济尔哈朗迎于台下”^③。可见把住室习惯于建在高台之上，是女真族长期生活在山上所养成的。

3. 楼阁林立

沈阳故宫的早期建筑中，楼阁的建筑很多。如据满文《黑图档》记载所统计出来的早期中，就有肉楼（十间）、龙楼、凤楼（各五间），崇政殿前的东、西五间厢楼，东、西七间楼，大清门以西的九间转角楼，大清门东、西的各三间厢楼，大清门外的东、西五间楼、炭楼，高台上的凤凰楼等十四座近百间，几乎占全部早期建筑的二分之一。在一座宫殿中，盖了这么多的楼，是历代宫殿中所罕见的。为什么早期建筑中会有这么多楼阁呢？这大约仍要归结于和女真族的生活习尚有关。女真是一个山地的狩猎民族，喜于居高，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生活习惯。譬如《满洲实录》卷二记载说：“丁亥年太祖于硕里口呼兰哈达下，东、南二道，一名嘉哈，一名硕里加河，中一平山，筑城三层，启建楼台”。汉文的“楼台”满文写做 yamun lose tai 意思是“衙门、楼子、台”。这是说努尔哈赤在万历十五年，于呼兰哈达岗一开始便修建了办事的机构、楼阁和高台。朝鲜使者申忠一曾到过这里，并且把这里的建筑绘了图，其中努尔哈赤的住宅称为“木栅栏内的奴酋家”，共有房65间左右，而楼阁占整个建筑的36%，计有23间。申忠一称之为“小酋”的舒尔哈齐家，住在另一木栅栏内，共有房舍54间左右，其中楼阁13间，占房舍总数的24%。可见自呼兰哈达岗开始，女真的贵族们便喜欢建高台并在高台上，建楼阁作为居室，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沈阳。因为故宫是建在平地上，所以楼阁便更多于山地的呼兰哈达。

4. 口袋房

清宁宫是故宫的正宫，为五间硬山式建筑。它的建筑形式纯属我国北方民族所独有的形式